

希特勒与奥地利人^{*}

——在完全一体化与局部镇压之间

阿诺德·苏潘
(Arnold Suppan)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约有130万奥地利成年男子和少年卷入战争,成为希特勒历次对外扩张的参与者。这一结果的发生来源于一战后德国与奥地利许多政治家、军官、经济界人士、工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主张的合并思想。在希特勒的鼓吹下,1938年4月,99.6%的奥地利人以公投的形式支持“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的再统一”,奥地利成为法西斯德国的一部分,许多奥地利人主动投身希特勒的对外侵略,同时,也有不少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对奥地利社会造成了无尽的伤害。

关键词 合并思想 希特勒 奥地利 历史记忆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下攻入波兰,其中的一部分军队(一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两个山地师与三个步兵师)以奥地利人为多数。他们部分通过上西里西亚,部分通过斯洛伐克完成了行军。与1914年8月的情形有所不同,他们出发前没有在家乡驻地^①接过送别的鲜花。为1918年的战败与1919年的《圣日耳曼条约》复仇雪耻的热望在当时也不存在。就连希特勒在9月1日当天发表于帝国议会的讲话也没有唤起人们多少热情。可供比较的只有如下事实:奥地利人继1914年后第二次与英法两国开战了,他们很快就以各种身份^②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参与者。德军对波兰的进攻越过了维斯瓦河与散河沿线的秘密分界线(签订于1939年8月23日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附录规定)。奥地利的士兵在散河一带第一次碰到了红军的部队。闪击波兰后,希特勒德国在22个月内相继发动了10次“闪电战”:1940年初对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法国,1941年2月出兵利比亚,4月和5月对南斯拉夫与希腊,6月22日进攻苏联。12月11日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甚至让奥地利人卷入了与西方超级强权

* 本文是在2014年9月1日于奥地利科学院的学术报告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① 其中有维也纳、诺伊施塔特、布魯克-諾伊多夫、克雷姆斯、圣珀尔滕、恩斯、林茨、韦尔斯、斯太尔、布鲁克、莱奥本、格拉茨、克拉根福特、菲拉赫、萨尔茨堡、库夫施泰因、因斯布鲁克、布雷根茨。

② 例如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骨干、军官、士兵、企业家、公务员、教授、教师、医生、护士、农民、军备制造工人、盖世太保特务与集中营看守。

的对抗。1943 年 7 月意大利也沦为战场,1944 年 9 月战火烧到了匈牙利。^①

作为陆海空三军还有党卫军的指挥官与士兵,奥地利人参加了上述所有的军事行动。整个战争期间,有超过 130 万名来自“东方边区”(现在的奥地利)的成年男子与少年投入了战斗,其中的 24.7 万人在欧洲与北非的各大战场或大西洋与地中海的激流中丧生。1934 年落成于维也纳霍夫堡宫外城门中的“奥地利英雄纪念碑”,最初目的是向“奥地利帝国 1618—1918 年间的英雄之子”致敬,但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也把二战的阵亡者包括在内。不仅如此,还有数以千计的烈士纪念碑遍布奥地利几乎所有的乡镇与公墓,罗列着二战与一战的阵亡者姓名。^② 人们由此可以迅速分辨出哪些家庭遭受了最大的损失。然而,无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各联邦州所立的纪念碑上都看不到 1945 年 4 月 27 日发表的独立声明:士兵们“被引向一场毫无意义与前途的征服战争”,“这场战争毫无顾忌地把我们国家的数十万男儿变成了牺牲品”。人们想找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也是徒劳的。对于战后奥地利的社会而言,战争带来的损失几乎难以衡量。除了阵亡者,还有 17 万终身残疾的重伤员,再加上数十万战争遗孀与战争遗孤,他们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在战后必须得到照料。尽管在东线和其他战线损失惨重,尽管有很多医护专列从东部驶来,尽管盟军在 1943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的《莫斯科宣言》中声明将重建奥地利,多数奥地利的士兵还是战斗到了 1945 年 5 月初德军投降。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被纳粹的宣传蒙蔽了。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保卫欧洲免遭“野蛮的东方(等同于布尔什维克)”入侵,这也包括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与游击队作战。他们希望与亲密的战友一起回到奥地利的家乡。大约 50 万人最终被盟军俘获。尽管当时存在若干带有一定地域歧视意味的嘲讽(“帝国德意志人”“普鲁士人”“德国佬”和“东方边区人”),但德、奥士兵的参战意愿并无明显差别。奥地利的军官和士兵无疑也是众多战争罪行的参与者——特别是在苏联、南斯拉夫(克拉列沃与克拉古耶瓦茨)、希腊(卡拉夫里塔)与意大利(马尔扎博托)。^③

一、合并思想的来源

1918—1919 年前后出现的合并思想一直活跃在众多德国与奥地利政治家、军官、教授、经济界人士、工程师、作家和艺术家的头脑中,1928 年 7 月的德意志歌唱节就是明证之一。在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eraphicus Peter Schubert)逝世 100 周年之际,13 万名来自德国与奥地利各地的歌手乘坐彩车穿行于维也纳的英雄广场与环形大道,70 万人目睹了这一盛况。在时任奥地利总统的米夏埃尔·海尼施(Michael Hainisch)看来,这一“歌手组成的军队”正是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象征。柏林

^① Klaus A. Maier, Horst Rohde, Bernd Stegemann, Hans Umbreit, Die Errichtung der Hegemonie auf dem europäischen Kontinent, i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Nr. 2, Stuttgart 1979, 103 u. 112;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Darmstadt 2000, 325—330; Erwin A. Schmidl, *März 38. Der deutsche Einmarsch in Österreich*, Wien 1987, 297—299.

^② 例如,位于瓦豪河谷的斯皮茨小镇有一座烈士纪念碑,上面刻有 102 名一战阵亡者姓名与 134 名二战阵亡者姓名。提供两个数字以供参考:在 1934 年共和保卫联盟发动的二月起义中有 314 人死亡;在奥地利纳粹党人于同年发动的七月政变中有 260 人死亡。

^③ Rüdiger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2. Auflage, München 2000; Richard Germann, *Die „Österreicher“ in Ost- und Südosteuropa im Zweiten Weltkrieg*, Phil. Diss. (gedruckt), Univ. Wien, Wien 2006; Thomas R. Grischany, *The Austrians in the German Wehrmacht, 1938—1945*, Chicago 2007; Walter Manoschek, Hans Safran, *Österreicher in der Wehrmacht*, in: Emmerich Tálos, Ernst Hanisch, Wolfgang Neugebauer (Hg.), *NS-Herrschaft in Österreich. Ein Handbuch*, Wien 2001, 123—158; 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Hg.),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Dimensionen des Vernichtungskrieges 1941—1944*, Ausstellungskatalog, Hamburg 2002, 508—529; Lothar Höbelt, *Österreicher i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38 bis 1945*, in: *Truppendifferenz*, Heft 5/1989, 417—432; Foreign Office/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Hg.), *Austria. Basic Handbook*, London 1944/4, Kap. VI: Austria at War. 位于霍夫堡宫外城门左侧的奥地利抵抗纳粹运动牺牲者纪念碑直到 1965 年才设立。

的《沃斯报》(Vossische Zeitung)则认为,歌唱节是“来自整个帝国的德意志人向属于德意志的维也纳致敬”。然而,当柏林与维也纳在1931年3月19日决定“整合德国与奥地利的关税与贸易政策”时,在巴黎、布拉格、罗马和伦敦掀起了愤怒的浪潮,特别是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感觉受到了“德意志修正主义”的挑衅。通过国际联盟的最高委员会,这个问题最终交由海牙国际法庭裁决,并以8:7的投票结果通过认定:德奥关税联盟虽然没有违反《圣日耳曼条约》对德奥合并的禁令,却违反了1922年《日内瓦协议》的1号记录。这一裁决激怒了德国与奥地利的舆论,损害了分别以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和卡尔·布莱什(Karl Buresch)为首的德奥两国政府,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下简称“纳粹党”)赢得193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以及下奥地利、萨尔茨堡与维也纳三个联邦州议会选举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共和保卫联盟发动的二月起义以及政府军对他们的镇压也帮助了纳粹党人。然而,由于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ß)在奥地利纳粹党人发动的七月政变(希特勒部分知情,后以失败告终)中遇害,使希特勒对奥地利选民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暂时中止。不过,1935年1月萨尔区全民公投的成功旋即打破了这一局面。^①

德国与奥地利在1936年签署了《七月协定》,抑或正是因为有这个协定,奥地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没预料到,希特勒会这么快在第二年的11月5日就告知帝国战争部部长、外交部部长与陆海空三军最高统帅,他要“征服”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就在1938年将采取行动,如果那时法国陷入了一场同其他国家的战争。“通过兼并捷克与奥地利取得的粮食足以供给五六百万人,前提是采取强制移民措施,从捷克迁走200万,从奥地利迁走100万”(除了犹太人,尚不清楚希特勒在此还指的哪些人)。“将两国并入德国可以从根本上减轻我们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负担。边境线变得更短更理想,武装力量可以解放出来用于其他目的,还有可能成立新的部队,数量最高可达12个师,也就是说每100万居民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师”。希特勒的论据,一是必须遏制德意志文化在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衰落;二是必须赢得“农业经济空间”;三是争取实现重要原材料(煤炭、矿石、纤维材料和食用油等)“有条件的”自给自足。总而言之,“为了解决德国问题,只有运用暴力这一条道路可走。这条道路从来就充满了风险。弗里德里希大帝为了取得西里西亚进行的战斗以及俾斯麦对奥地利与法国发动的战争在当时都面临着空前的风险,而普鲁士在1870年的迅速行动使得奥地利可以置身战争之外”。^②

二、合并的前前后后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在他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严厉斥责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背叛”了德意志人民。他要求大赦被逮捕的纳粹党人,任命纳粹党籍的维也纳律师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为内政部部长,还要求把奥地利的经济体

^① Ernst Hanisch, Wien, Heldenplatz, in: Etienne François, Hagen Schulze (Hg.), *Deutsche Erinnerungsorte I*, München 2001, 105–121, 114f;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 *Hülers Niederlage in Österreich. Bewaffneter NS-Putsch, Kanzlermord und Österreichs Abwehrsieg 1934*, Hamburg 1984, 139–166; Alfred Low, *The Anschluss Movement 1931–1938 and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1985;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1945*, Chapel Hill 2000, 14–22;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Darmstadt 1998, 657–659; Klaus Koch, Walter Rauscher, Arnold Suppan (Hg.), *Aufenpolitische Dokumente der Republik Österreich 1918–1938* (ADÖ), Band 7, *Das österreichisch-deutsche Zollunionsprojekt. 12. Februar 1930 bis 11. September 1931*, Wien/München 2006, Dok. 1077.

随着德奥关税联盟的失败,奥地利工商信贷银行亦于1931年5月宣告破产,后者不得不由政府、奥地利国家银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接收。参阅 Roman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Wien 1995, 388–390。

^② Bernd-Jürgen Wendt, *Großdeutschland. Außenpolitik und Kriegsvorbereitung des Hitler-Regimes*, München 1987, 191–202; Erwin A. Schmidl, *März 38. Der deutsche Einmarsch in Österreich*, Wien 1987, 32f.

系与德国合为一体。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扬萨(Alfred Jansa)仍想通过武装抵抗来争取大国对奥地利的支持,但是大规模的纳粹示威游行爆发了,祖国阵线组织了反游行作为回应。为了摆脱来自德国的压力,许士尼格宣布在3月13日就奥地利的独立举行“全民公投”。他预计可以取得65%—75%的赞成票,但是党卫军与冲锋队在维也纳与所有的联邦州首府大肆活动,并且每隔一小时就会从柏林传来一份最后通牒。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许士尼格被迫于3月11日晚上宣布,奥地利屈从于暴力。许士尼格不希望“德意志人的血”白白流淌,因而放弃了军事抵抗。就在当晚,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被迫任命英夸特为新总理。1938年3月12日下午,希特勒从他的出生地莱茵河畔布劳瑙出发,开启了他的得胜之旅,德国大军紧随其后。他经过林茨到达维也纳,沿途有数十万上奥地利人、下奥地利人和维也纳人夹道欢呼。在军队进入的同时,奥地利纳粹党人攫取了一系列城市与联邦州的权力。希特勒在林茨受到热烈欢迎,他为此感到振奋,于是就在3月13日当晚接受了新内阁通过的关于“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再统一”的联邦宪法,并下令通过一部平行的帝国法律。奥地利确实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帝国的一个州。奥地利的历史似乎不可逆转地汇入了大德意志的主干道。1938年3月15日,维也纳的英雄广场上聚集了大约50万兴致勃勃的奥地利民众。希特勒面对欢呼的人群夸张地宣布:“从现在起,德意志人民最古老的东方边区应当成为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帝国最年轻的堡垒。”^①

13岁的维也纳中学生利奥波德·罗森迈尔(Leopold Rosenmayr)当时是一名许士尼格支持者的儿子,希特勒的讲话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所经历的1938年3月弥漫着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数十万高呼“希特勒万岁”的人,加上那些被盖世太保迫害的犹太人与政治反对派,是这种紧张气氛的来源:

1938年3月11日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写着作业,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得到如此彰显的身份竟然可以制造出如此的暴虐。我透过临近开普勒路的窗户可以看到法沃里腾大街,那里正有很多人打着旗帜与横幅向市中心走去。他们齐声高呼纳粹主义口号,其中有一句在后来不断地被重复:“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法沃里腾那个工人区吗?那是一条长长的队列,正在庆祝他们战胜了一个内部分裂的奥地利,而这个奥地利正在走向沉沦。^②

有不少人在“合并”的那几天就不得不躲起来。因为在德军开进奥地利的同时,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已经带着他的爪牙降落在阿斯潘机场。他们立即开展工作,逮捕许士尼格政权的支持者、社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警察与盖世太保到达现场的速度比军队还要快。许多犹太人被纳粹暴徒虐待或施以酷刑。许多犹太人的店铺被洗劫。“追捕犹太人”为经济社会领域的不满情绪充当了“安全阀”。这种行为发生在奥地利这样的法治国家意味着文明的完

① Kurt von Schuschnigg, *Ein Requiem in Rot-Weiß-Rot - Aufzeichnungen des Häftlings Dr. Auster*, Zürich 1946, 39–42; Gerhard Botz, Schuschniggs geplante “Volksbefragung” und Hitlers “Volksabstimmung” in Österreich. Ein Vergleich. In: *Anschluß 1938. Protokoll des Symposiums in Wien am 14. und 15. März 1978*, Wien, 1981, 220–243; Erwin A. Schmidl, *März 38. Der deutsche Einmarsch in Österreich*, Wien 1987, 103–109 u. 161–186;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37–343;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Darmstadt 2000, 119–125;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1945*, Chapel Hill 2000, 25–32; Maurice Williams, *Gau, Volk und Reich. Friedrich Rainer und der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nach Selbstzeugnissen*, deutsche Bearbeitung von Ulfried Burz und Claudia Fräss-Ehrfeld, Klagenfurt 2005, 70–100.

② Leopold Rosenmayr, *Überwältigung 1938. Frühes Erlebnis-späte Deutung. Rückblick eines Soziologen in die eigene Kindheit und seine frühe Jugend*, Wien/Köln/Weimar 2008, 见封底。

全崩塌。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在巴洛克风格的卡尔教堂前碰到一群歇斯底里的暴徒,他还在克尔特纳大街目睹了青少年向犹太人的商店橱窗扔石头。另一名外国记者格迪(G. E. R. Gedye)在市中心见证了人群不断地呼喊:“打倒犹太人!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消灭犹太人!绞死许士尼格!赛斯-英夸特万岁!打倒天主教徒!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就连德国人都开始对这种泛滥的反犹情绪产生了看法,这种情绪正是他们自己在奥地利煽动起来的。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奥地利的每个犹太商店都通过一个自我任命的纳粹委托人完成了“雅利安化”。^① 1938年4月28日,柏林最终下令“登记犹太人的财产”。^②

维也纳大主教西奥多·因尼策尔(Theodor Innitzer)向希特勒保证了奥地利天主教徒的忠诚,在1918—1920年间担任国家总理的社民党人卡尔·伦纳(Karl Renner)则通过4月3日的《新维也纳日报》表达了对“合并”的支持。作为1919年奥地利和平使团的领导人,伦纳认为“合并”是“对1918—1919年间的耻辱、对《圣日耳曼条约》与《凡尔赛和约》作出的切实赔偿”。很多奥地利人的感受显然同因尼策尔和伦纳一样。纳粹的宣传动用了一切媒介手段:招贴画、报纸、电影、音乐、灯光、色彩、图像、飞机、钟楼、礼花。普鲁士州的州长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是3月11日最后通牒的幕后导演,他公布了一套针对奥地利的大规模经济方案。失去社保的人即刻被纳入失业救济范围,而拍卖禁令可以取悦陷入贫困的农业界。希特勒在4月3—9日进行了一次“东方边区之旅”,他在格拉茨、克拉根福特、因斯布鲁克、萨尔茨堡和林茨受到数十万人的欢迎,仅格拉茨一地就来了大约40万施泰尔马克人,在因斯布鲁克则聚集了大约15万蒂罗尔人。奥地利民众欢呼雀跃的照片和影像传遍了世界。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对众人心态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

对于“奥地利”的居民而言,希特勒在1938年3月占领维也纳意味着民族的解放;他们就此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遗产,与自己的民族国家团结起来。^③

三、1938年4月的公投结果:奥地利被德国吸收

确实有99.6%的奥地利人在1938年4月10日投票赞成“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的再统一”,并支持“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单”。从那天起,在奥地利就一直存在讨论,究竟有多少奥地利人会在国际联盟监督下举行的秘密公投中由衷地投票赞成“合并”呢?可以确定的是,会有各

^① “雅利安化”是Arisierung的常用中文译法,纳粹用语,意为把犹太人的财产变成非犹太人即日耳曼人的财产。

^②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41f.; Gerhard Botz, *Nationalsozialismus in Wien. Machtaufnahme, Herrschaftssicherung, Radikalisierung 1938/39*, Erweiterte Neuauflage, Wien 2008, 128 – 133; Ian Kershaw, *Hitler 1936 – 1945*, Darmstadt 2000, 130 – 135; Werner Welzig (Hg.) unter Mitarbeit von Hanno Biber und Claudia Resch, „Anschluss“ – März/April 1938 in Österreich, Wien 2010, 44 – 58; William L. Shirer, *The Nightmare Years: 1930 – 1940*, Boston 1984, 296; G. E. R. Gedye, *Betrayal in Central Europe: Austria and Czechoslovakia: The Fallen Bastions*. New York 1939, 284; Adam Tooze, *Ökonomie der Zerstörung. Di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2008, 324f. 德国与奥地利犹太人的登记财产价值总额约为85亿帝国马克,外加70亿未收回的债务。

^③ 《新维也纳日报》,1938年4月3日,引自Walter Rauscher, Karl Renner. *Ein Österreichischer Mythos*, Wien 1995, 297 – 301;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46f. u. 357; Stefan Karner, *Die Steiermark im Dritten Reich 1938 – 1945. Aspekte ihrer politischen, wirtschaftlich-sozial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 Graz/Wien 1994, 58 – 63; 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 – 1918. 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London 1990, 279.

种各样的人投反对票(最受威胁的犹太人、虔诚的天主教徒、祖国阵线的骨干、君主主义者、共产党人、支持社民党的产业工人及其工会代表),加起来可能有 100 万人,而拥有投票权的人总共有 400 万。与上述人针锋相对的是奥地利的纳粹党人,还有在思想上与他们极为相近的“大德意志人”,他们也要占到 25%,甚至 35%。因此,那些占多数的“不问政治”之人的抉择才是决定性的。他们与其说是支持纳粹主义,倒不如说是更认同“合并”思想。他们在 1938 年初把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德意志帝国身上,因为后者使得大规模的失业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纳粹主义首先俘获了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青少年,因为至少在初期,纳粹主义宣扬诸如纪律、忠诚、服从与意志等价值观,以及通过“希特勒青年团”与“德意志少女联盟”这样的组织提供了一系列诱人的体育科技文化活动。另一个受欢迎的姿态就是将货币整合为 2 个帝国马克兑换 3 个奥地利先令,这清楚地表明先令升值了;要知道帝国银行给出的兑换建议本来只有 1:2。奥地利纳粹党员的数量上升(截至 1943 年 5 月已有近 70 万人)也表明,多数人赞同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很多奥地利的男人和女人还纷纷自愿加入或被征召进入其他纳粹组织,例如冲锋队、党卫军、纳粹机动车司机军团、德意志劳动阵线、纳粹医生联盟、纳粹公务员联盟、纳粹教师联盟、纳粹学生联盟、纳粹农民协会、纳粹妇女协会等等。^①

“合并”对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际法专家查尔斯·范威克 (Charles G. Fenwick) 的判断很准确:

今天我们见证的不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惯常条约,甚至也不是影响奥地利主权完整的德奥同盟协定,而是奥地利被德国完全吸收了。奥地利从此成为德国的一个省。这个国家的名称起源可以追溯到 10 世纪甚至更早,如今却在国际法记录中消失了。^②

然而,国际社会勉强接受了“合并”,只有墨西哥与苏联提出了抗议。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贾德干 (Alexander Cadogan) 爵士早在 1938 年 3 月 17 日就承认,希特勒只不过是铲除了 1919 年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处不公。政务次官奥姆·萨金特 (Orme Sargent) 爵士则心灰意冷地断言:

德国枉顾国际法,用赤裸裸的暴力占领了奥地利,各个民主大国冷眼旁观。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对于所有其他可能妨碍德国的小国都是一个警告,会产生深远的影响。^③

奥地利共和国变成了“奥地利州”,从前的 9 个联邦州缩减为 7 个大区。^④ 1939 年 4 月 14 日生

^① Foreign Office/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Hg.), *Austria Basic Handbook*, London 1944/45, Kap. VI: Austria at War; Gerhard Botz, *Nationalsozialismus in Wien. Machtübernahme, Herrschaftssicherung, Radikalisierung 1938/39*, Erweiterte Neuauflage, Wien 2008;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45 – 347 u. 359; Gerhard Jagschitz, Von der „Bewegung“ zum Apparat: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NSDAP 1938 bis 1945, in: Emmerich Tálos, Ernst Hanisch, Wolfgang Neugebauer (Hg.), *NS-Herrschaft in Österreich. Ein Handbuch*. Wien 2001, 88 – 122;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 – 1945*, Chapel Hill 2000, 33 – 39; Roman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Wien 1995, 404.

^② Charles Fenwick, (1938): Editorial Comment: Fuit Austria. 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2, 312 – 314, 312. Gerhard Botz 与 Ernst Hanisch 使用的概念“近似革命的”与“貌似合法的夺权”并不能掩盖“德意志帝国的帝国主义干涉”,因为后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参阅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42。

^③ Erwin A. Schmidl, *März 38. Der deutsche Einmarsch in Österreich*, Wien 1987, 239 – 251.

^④ 其中,布尔根兰州分摊给了“下多瑙”大区和施泰尔马克大区,福拉尔贝格州并入蒂罗尔大区,东蒂罗尔并入克恩滕大区,奥赛兰德并入“上多瑙”大区。

效的《东方边区法》又将这些大区提升为帝国大区,由帝国总督和大区领导来管理。希特勒早在1938年5月就任命了7名奥地利纳粹党领袖为大区领导。^①直到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因为严重腐败被1938年4月10日全民公投的组织者、普法尔茨人约瑟夫·布吕克尔(Josef Bürckel)取代后,“外来”纳粹党人在维也纳的存在才得到加强。但这个“啤酒桶”(维也纳人对布吕克尔的蔑称)在位时间并不长,1940年8月1日,他被帝国青年领袖、柏林人巴尔杜·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取代,后者一直对维也纳文化颇有好感。1938年10月签署的《慕尼黑协定》,将南摩拉维亚与南波希米亚地区^②共计33.5万居民一并纳入了上多瑙和下多瑙两个帝国大区,相关大区的领导人及其管辖的民众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类似情形也发生在1941年4月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之后,下施泰尔马克^③、梅扎河谷与上卡尔尼奥拉^④被纳入帝国大区施泰尔马克与克恩滕。当地的绝大多数居民是斯洛文尼亚人(至少有75万),无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也绝不会同意。对于希特勒下令推行的强制日耳曼化政策,他们更是完全不能接受。^⑤

奥地利人还必须面对更多难堪的真相:1938年3月掀起逮捕浪潮以后,4月以来已经3次将政权反对者送往达豪集中营;对私人银行、企业与房地产实行“疯狂的雅利安化”(总共涉及单位7万个);将皇冠、权杖等帝国的权力象征物从维也纳的珍宝阁运往纽伦堡;1938年10月希特勒青年团对大主教宫殿发起冲锋;11月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实施集体迫害,剥夺犹太人的职业和住所;1939年秋将首批犹太人运往位于总督辖区的隔都;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达成的协议,背叛了讲德语的南蒂罗尔人。^⑥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民众对“德意志民族的领袖与德意志帝国总理”的热烈拥戴。1940年7月德军战胜法国之后,民众对希特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直到1941年秋天,对苏联的战争导致东部战线的阵亡人数恐怖上升,特别是3个“奥地利”师(维也纳的第四十四、第一九七步兵师与下奥地利的第一〇〇轻装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歼,而希特勒又在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才使得多数“奥地利人”与德国人对希特勒非同寻常的崇拜降温。1943年2月18日,戈培尔呼吁进入“总体战”,意味着第三帝国的军事处境变得更困难了。尤其对那些收听“敌台”的“奥地利

^① 3个克恩滕人胡贝特·克劳斯纳(Hubert Klausner)、弗里德里希·雷纳(Friedrich Rainer)与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分别掌管克恩滕、萨尔茨堡与维也纳,雨果·朱瑞(Hugo Jury)负责下多瑙,奥古斯特·埃格鲁伯(August Eigruber)负责上多瑙,齐格弗里德·乌伊贝雷特尔(Siegfried Uiberreither)负责施泰尔马克,弗朗茨·霍夫(Franz Hofer)负责蒂罗尔。

^② 涉及城市:布热茨拉夫、瓦尔齐采、米库洛夫、胡斯托佩切、兹诺伊莫、斯拉沃尼采、新比斯特日采、新赫拉迪、卡普利采、上布罗德、克鲁姆洛夫、霍尼普拉纳。

^③ 涉及城市:马里博尔、采列、普图伊。

^④ 涉及城市:克拉尼、拉多夫利察、耶塞尼采。

^⑤ Foreign Office/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Hg.), *Austria Basic Handbook*, London 1944/45, Anhang I: Territories incorporated in Austria, 1938 – 1941;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63 – 366; Arnold Suppan, *Hitler-Benes-Tito. Konflikt, Krieg und Völkermord in Ostmittel- und Südosteuropa*, 3 Bände, 2. Auflage, Wien 2014, Band 1, 490 – 522 u. Band 2, 927 – 940; Josef Schöner, *Wiener Tagebuch 1944/45*, Hg. v. Eva-Marie Csáky, Franz Matscher, Gerald Stourzh, Wien/Köln/Weimar 1992, 61f.; Stefan Karner, *Die Steiermark im Dritten Reich 1938 – 1945. Aspekte ihrer politischen, wirtschaftlich-sozial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 Graz/Wien 1994, 123 – 142; Tóme Ferenc (Hg.),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ntnationalisierungspolitik in Slowenien 1941 – 1945*, Maribor 1980. 奥地利于1910年对南摩拉维亚与南波希米亚地区进行了人口普查,将这两个地区并入德国正是以这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人口数为依据的。

^⑥ 1939年6月23日,根据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达成的协议,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与意大利的警察长官阿图罗·博基尼(Arturo Boccini)、内政部国务秘书吉多·布法里尼(Guido Buffarini)商定,今后要把讲德语的南蒂罗尔人迁走。所有当地居民最晚要在1939年12月31日作出决定,是“留在这里”还是迁出。对此,“南蒂罗尔民族斗争联盟”高呼口号:“我们全体加入帝国”;而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与教徒运动的积极分子却主张“留在这里”。最终超过80%的南蒂罗尔人选择了加入德国国籍并迁出了南蒂罗尔。截至1943年,在大约21万名“自选国籍者”中有近7.5万人迁往北蒂罗尔、福拉尔贝格、萨尔茨堡、上奥地利、克恩滕、施泰尔马克,甚至还有人去了苏台德区与卢森堡。二战结束后,只有两万人重返南蒂罗尔。参阅 Michael Gehler, *Tirol im 20. Jahrhundert. Vom Kronland zur Europaregion*, 2. Auflage, Innsbruck/Wien 2009, 174 – 180。

人”来说(纳粹党人也听 BBC 广播),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尽管如此,广大民众对希特勒的忠诚并没有改变。1943 年 8 月 13 日以后,维也纳的帝国电台用“布谷鸟鸣”向居民发布盟军空袭警报,清楚地表明了纳粹政权在空战中缺乏防御能力。仅维也纳一地就经历了 55 次空袭,造成 8769 人死亡;格拉茨、克拉根福特、菲拉赫、因斯布鲁克、诺伊施塔特、斯太尔、林茨与萨尔茨堡也经常被空袭,死亡人数总共超过了 1 万人。还有数十万因空袭流离失所的“帝国德意志人”(来自鲁尔区等地)被安置在“阿尔卑斯与多瑙行政区”,他们丝毫不能帮助提振士气,特别是那些来自柏林与汉堡的北德新教徒对“东方边区”的住所颇为不满。1945 年 3 月 12 日盟军的空袭摧毁了国家歌剧院一带。外交家约瑟夫·申纳(Josef Schöner)在二战后的奥地利联邦政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把这一天称作“对于我们心爱的城市黑暗的一日”。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①

四、希特勒的“克里斯玛统治”

即使借助马克斯·韦伯的“克里斯玛统治”概念,后世之人仍然很难理解一个说话方式怪异、手势夸张、频繁诉诸语言暴力的政治边缘人,一个业余的权力爱好者,竟然在一个领先世界的工业国取得如此地位。人们把集体性的恐惧、被拯救的渴望、全知全能的幻想与歇斯底里的情感投射在这一个人身上。到 1938 年底,希特勒已经把“帝国德意志人”“东方边区人”与“苏台德德意志人”成功地凝聚在一起。尽管在二战爆发后,“大德意志帝国”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这个“民族共同体”仍然紧密团结在一起,把希特勒当作救星来崇拜所激发出的能量着实令人惊讶。希特勒既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与种族主义者,又是一个精于计算的现实主义者,他可以给人一种理智而真诚的感觉。他有着摩尼教的思维方式,还有威胁性的能量爆发,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此印象深刻。希特勒的规划与幻想具有犯罪性与毁灭性,他的种族纯洁论与世界统治论,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道德底线。但是,纳粹政权采取了强有力措施以蒙蔽、欺骗、恐吓民众,并且时刻准备着运用暴力,这足以填平纳粹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道德鸿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领袖的独裁统治之下形成了一套由国家、党、经济部门、军队与党卫军组成的多头统治体系,相互之间经常爆发残酷内斗。尽管纳粹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奥地利以及巴伐利亚,但希特勒很难说是一个“典型的奥地利纳粹主义者”,因为他毫不费力地吸收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传统。在这个方面,索姆河前线的 4 年服役生涯应该对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②

^① Foreign Office/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Hg.), *Austria. Basic Handbook*, London 1944/45, Kap. V: The Armed Forces; Josef Schöner, *Wiener Tagebuch 1944/45*, Hg. v. Eva-Marie Csáky, Franz Matscher, Gerald Stourzh, Wien/Köln/Weimar 1992, 25–30, 64–68 u. 105–108;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1945*, Chapel Hill 2000, 80–92, 162 u. 186–194. 维也纳“小流氓”在足球比赛期间进行反德抗议,例如在 1940 年 11 月 17 日维也纳阿德米拉队与沙尔克 04 队的比赛期间就发生了严重骚乱。

^② Hans-Ulrich Thamer, *Verführung und Gewalt. Deutschland 1933–1945*, Berlin 1986, 19;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Darmstadt 2000, 407; Zara S. Steiner, *The Triumph of the Dark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33–1939*, Oxford 2011, 10;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67;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3. Auflage, München 2008, 933–937; Ulrich Herbert,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14, 493–504; Foreign Office/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Hg.), *Austria. Basic Handbook*, London 1944/45, Kap. VI: Austria at War; Thomas Weber, *Hitlers erster Krieg: der Gefreite Hitler im Weltkrieg. Mythos und Wahrheit*, Berlin 2011; Josef Schöner, *Wiener Tagebuch 1944/45*, Hg. v. Eva-Marie Csáky, Franz Matscher, Gerald Stourzh, Wien/Köln/Weimar 1992, 44f. 1942 年 8 月 21 日,“奥地利”的山地部队登顶高加索山脉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海拔 5642 米),并把帝国军旗立在峰顶。根据施佩尔的回忆,希特勒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几天过后仍然在骂“这些爬山的疯子”,称这些人“就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参阅 Albert Speer, *Erinnerungen*, Berlin 1969, 253。

五、合并对帝国的好处和“奥地利”社会的变化

“合并”首先为纳粹的军事经济带来了好处：奥地利可以供应铁、铅、锌、镁、石油、木材、牛奶、黄油和奶酪；奥地利的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十分出色，并且拥有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奥地利国家银行拥有约 78 吨黄金（价值 4.677 亿先令），价值 6020 万先令的外汇，价值在 9400 万至 1.5 亿先令之间的票据。此外，私人黄金储备与外国票据价值可达 12.5 亿先令。奥地利的黄金早在 1938 年 3 月 17 日就被运到了柏林。仅仅是奥地利的“外汇陪嫁”就使德国的储备翻了一番。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还有戈林的帝国工厂，立即向奥地利的银行与工业企业^①伸出了手。奥地利以前的国有资产成了帝国资产，联邦铁路、公路与邮政系统也不例外。在奥地利企业中，德国持股份额随着战争演进由 9% 跃升至 57%，这种情况在银行业、电气工业、采矿冶金工业与化学工业领域尤为突出。“合并”也加强了“第三帝国”对中东欧与东南欧小国的权力——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与南斯拉夫。^②

1938 年 4 月以来，由于人口政策方面的原因，“东方边区”的婚姻登记与出生人口明显增长，直到 1943 年这一趋势中止。1939 年 5 月 17 日的人口普查显示，居民数量为 667.8 万人；截至 1944 年 1 月 1 日，奥地利人口净增长 18.4 万人。出生率的提高亦与义务民事婚姻制度的实施有关。纳粹主义斩断了人们与家庭、教会以及社会阶层的传统联系。纳粹的创造就业计划（首先是大力发展战略军备，其次才是备受赞誉的高速公路建设^③）使得“东方边区”的就业人数从 1938 年 1 月的 150 万增长到同年 11 月的 210 万；而失业人数在此期间从超过 50 万下降到不足 15 万，到 1941 年 1 月底就只剩 4291 人了。通过建立与扩建大型军工企业^④、精炼提纯工业^⑤、热力发电厂^⑥与水力发电厂^⑦，“东方边区”的工业基础得到极大增强，奥地利西部的工业化程度也提高了。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与纳粹党满足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指标，企业管理工作交由经济界人士与技术官僚负责。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推行“工业自行负责制”，使军需用品产量直到 1944 年中期仍在增长。“德意志劳动阵线”的自身定位是工人、企业家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中介”，避免了实际工资的灾难性降低。盟军开始对德国西部工业区进行轰炸后，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迁往“东方边区”以及“仆从国”。到 1945 年初，10% 的轻武器、20% 的火车头、30% 的 Me - 109 战斗机

^① 信贷银行协会、各州银行、阿尔卑斯山公司（位于多纳维茨，在施泰尔马克拥有矿山）、斯太尔工厂、林茨造船厂与卡普伦发电厂项目。

^② Roman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Wien 1995, 403 – 407 u. 423; Oliver Rathkolb, Theodor Venus, *Reichsbankanstalten 1938 – 1945 am Beispiel der Reichsbankhauptstelle Wien*, Wien 2013, 20f; Adam Tooze, *Ökonomie der Zerstörung. Di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2008, 290 – 293; Gerald D. Feldman, Oliver Rathkolb, Theodor Venus, Ulrike Zimmerl, *Österreichische Banken und Sparkass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in der Nachkriegszeit*, 2 Bände, München 2006, Band 1, 23 – 278.

^③ Adam Tooze (*Ökonomie der Zerstörung. Di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2008, 16) 证实，早在 1933 年，军备支出就已经是全部民事就业项目支出（例如建设高速公路和住宅区、翻修老建筑等）的近 3 倍。纳粹政权在 1933—1939 年间实施的军备计划“须要在最大程度上调动资源，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所能做出的最大动作”。

^④ 位于林茨、斯太尔、兰斯霍芬、圣瓦伦丁、克雷姆斯、西梅林、施魏夏特、诺伊施塔特、贝恩多夫、泰尔尼茨、米尔茨楚施拉格、卡普芬贝格、多纳维茨、安德里茨、格拉茨、尤登堡、费拉赫。

^⑤ 位于莫斯比尔鲍姆、维也纳的罗堡岛。

^⑥ 位于福伊茨贝格、蒂默尔卡姆。

^⑦ 位于伊布斯-佩森博伊格、卡普伦、施瓦贝格、拉法明德。

和 55% 的四号坦克都是在奥地利境内生产的。^①

纳粹政权通过农业机械化与《帝国农庄继承法》(妻子和女儿遭到歧视),以及一项免除债务的措施确保了大多数农民的忠诚,保证了战时稳定的食品供给。战争期间,繁重的劳动大多落在妇女身上,2/3 的农妇加上所有的女帮工一天要劳作 14—15 小时。尽管如此,由于帝国农业管理部门严格规范市场秩序,监督农庄履行纳粮义务,在 1944—1945 年的冬天没有再发生类似 1917—1918 年间的饥荒。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粮食、土豆和油料供给量在战争期间是不断增加的。在社会政策领域,纳粹引入了德国的社会保障法,使最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亦有所提升,孕产妇保护法得到完善。纳粹政权规定,“全体德意志青年男女”都有义务参加工作,并最终在 1943 年号召“全体投入工作”。总而言之,建立一个“现代”极权社会福利国家的趋势是很明显的。随着战争的演进,“东方边区”的外籍男女劳工(来自战败国或仆从国)数量不断增长,截至 1944 年 8 月已经超过 58 万人。这并不包括来自苏联、波兰、法国与南斯拉夫的 17 万战俘,也没有把集中营的犯人计算在内。例如毛特豪森集中营就为斯太尔 - 戴姆勒 - 普赫集团 (Steyr-Daimler-Puch) 提供了大量的奴工。^②

与等级制时期的奥地利正相反,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奥地利在全民公投之后很快就开始执行严厉的反教权主义路线,把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反教会传统推向了极致。这一转向也受到无神论的共产党人与社民党人的欢迎。1938 年 7 月 12 日,希特勒宣布废除奥地利同罗马教皇签订的条约。婚姻制度被国家化,新的国家机关接管了户口登记工作。1939 年出台的教会税法亦致力于加深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区隔,却仅仅引发了规模相对较小的退出运动。有大约 30 万“奥地利人”退出了罗马天主教会,在希特勒与戈培尔的倡导下成为“上帝信仰者”(非无神论者)。随着学校的去宗教化,纳粹政权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裂痕更加清晰了。天主教会的私立学校不是被关停,就是被改为国家政治教育机构(格特维克、莱姆巴赫、塞考、福劳、圣保罗)。“纳粹政权贪婪地盯上了教会的建筑”,26 座大型修道院^③与 188 座小一些的修道院被充公。另一方面,纳粹的宣传从 1941 年秋天起,试图把教会与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捆在一起。^④

六、合并之后的排斥与镇压

“合并”还意味着排斥、开除与驱逐——这在思想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校长弗里茨·科诺尔

^① Roman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Wien 1995, 408 – 415;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51 – 354; Stefan Karner, *Die Steiermark im Dritten Reich 1938 – 1945. Aspekte ihrer politischen, wirtschaftlich-sozial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 Graz/Wien 1994, 235 – 292;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 – 1945*, Chapel Hill 2000, 91f., 112 – 130, 159 u. 167. 1944 年 6 月 24 日至 25 日,施佩尔动用最严密的军事保护,在林茨组织召开了次会议,来自军工业的 300 名最重要人物应邀参会,其中有些人甚至被挑选出来,在上萨尔茨堡山得到希特勒的接见。参阅 Adam Tooze, *Ökonomie der Zerstörung. Di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2008, 727。

^② Roman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Wien 1995, 416 – 417 u. 432 – 434;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55 – 362; Florian Freund, Bertrand Perz, *Zwangsarbeit von zivilen AusländerInnen, Kriegsgefangenen, KZ-Häftlingen und ungarischen Juden in Österreich*, in: Emmerich Tálos, Ernst Hanisch, Wolfgang Neugebauer (Hg.), *NS-Herrschaft in Österreich. Ein Handbuch*. Wien 2001, 644 – 695.

^③ 例如克洛斯特新堡、圣弗洛里安、克雷姆斯明斯特、威尔赫林、萨尔茨堡圣彼得、阿德蒙特、拉凡特谷地圣保罗、维尔滕与梅勒劳。

^④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61f. u. 377f.;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 – 1945*, Chapel Hill 2000, 93 – 111.

(Fritz Knoll) 任职期间, 维也纳大学在短短几星期之内就以“种族”或政治为由, “清除”了 252 名教职员。在格拉茨与因斯布鲁克的各大学以及奥地利的其他高等院校都发生了类似的“清洗”。除了教师, 还有数千名大学生被开除。奥地利思想界的一部分代表人物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流亡海外: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经济发展理论》的作者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新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纯粹法学派的创始人汉斯·凯尔森 (Hans Kelsen)、语言哲学的奠基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 (Kurt Gödel)、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与美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 (Ernst Gombrich)。在 1938—1945 年间, 奥地利科学院的 21 名正式院士与通讯院士被迫离开了维也纳, 其中有生理学家恩斯特·特奥多尔·布吕克 (Ernst Theodor Brücke)、心理学家卡尔·布勒 (Karl Bühler)、实验物理学家维克多·弗朗茨·赫斯 (Victor Franz Hess)、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 (Wolfgang Pauli)、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弗兰克·普日布拉姆 (Alfred Francis Pribram)、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与地质学家弗朗茨·爱德华·修斯 (Franz Eduard Suess)。另一方面, 新当选的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斯尔比克 (Heinrich von Srbik) 是柏林帝国议会议员。对犹太知名人士的驱逐也发生在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与城堡剧院, 电影从业人员与卡巴莱小品演员亦不能幸免。与此同时, 一连串著名演员正在舞台或银幕上光彩夺目, 演艺事业一帆风顺。例如阿提拉·赫尔比格 (Attila Hörbiger) 与波拉·韦斯利 (Paula Wessely) 夫妇在纳粹宣传电影《归乡》中担纲主演, 该片为希特勒进攻波兰做了辩护。^①

纳粹政权在帝国全境遍设集中营, 对民众实施迫害、酷刑与谋杀。纳粹的恐怖统治体系主要由党卫军和警察机关 (盖世太保、刑事警察、保安处) 组成, 拥有成员两万名。其中, 盖世太保自己的特务只有大约 2000 名。盖世太保在维也纳 (原大都会饭店)、克拉根福特、萨尔茨堡、林茨、因斯布鲁克设有领导机关, 通过保护性拘留与酷刑在民众中散布恐惧。在 1938—1945 年间, 有大约 10 万名“奥地利人”被逮捕。政治反抗、拒服兵役或者社会抗议都会招致严厉惩罚——起码是送进集中营, 经常是判处死刑。总共有 2.5 万名“奥地利人”丧生在集中营, 外加至少 7000 名罗姆人 (吉卜赛人)。始建于 1938 年的毛特豪森 - 古森集中营下设 40 座附属营, 有大约 10 万人 (以波兰人、匈牙利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苏联人为主) 因为非人道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惨死在这里。^② 在 1940—1944 年间, 大约两万名来自达豪与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精神病患者在上奥地利的哈特海姆宫被送进毒气室。至少 2700 名活跃的奥地利抵抗者 (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天主教徒、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亚人、拒服兵役者) 被维也纳高级法院和人民法庭判处死刑。超过 500 名“奥地利”军官和士兵被帝国战争法庭以及其他军事法庭宣判死刑, 其中就有参与策划 1944 年 7 月 20 日“七二〇”密谋刺杀希特勒事件的总参谋部中尉罗伯特·贝尔纳迪斯 (Robert Bernardis)。

^① Herbert Matis,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Di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n Jahren 1938 – 1945*, Wien 1997, 27 – 35; William M. Johnston, *Österreichische Kultur- und Geistesgeschichte. Gesellschaft und Ideen im Donauraum 1848 bis 1938*, Wien/Köln/Weimar 2006, XII – XVII; Klaus Taschwer, Vorgeschichten der Vertreibung, in: *Der Standard* (Wien), 18. März 2015; Oliver Rathkolb, *Führertreu und Gottbegnadet. Künstlereliten im Dritten Reich*, Wien 1991. 1940 年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共有 73 名议员来自“东方边区”: 15 名官员、13 名司法人士、10 名商人与手工业者、9 名工程师与技术人员、7 名教授与教师、6 名工人与职员、4 名农民、4 名军官、两名医生、1 名记者以及两名其他人员。参阅 Foreign Office/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Hg.), *Austria. Basic Handbook*, London 1944/45, Anhang III.

^② 四五千名集中营犯人被直接杀害 (这里也有“毒气车”与毒气室)。自 1943 年起, 大部分 Me-262 喷气式战斗机 (梅塞施密特公司研制) 都是在古森河畔圣格奥尔根的巨型隧道中生产制造的。参阅 Die Presse (Wien), 2. Mai 2015, 1f.

还有超过 800 名牧师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其中 27 人死亡,15 人被处决。^①

因为绝大多数奥地利人都不认为“合并”是对奥地利的占领,而且许多奥地利纳粹党人都在党和国家机关、经济界、军队和警察机关身居要职,所以在奥地利不可能出现类似波兰、南斯拉夫或者法国那样的抵抗组织。准备工作做得最好的无疑是共产党,虽然他们在《莫洛托夫 - 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不得不保持沉默(不少党内同志被贝利亚直接交给了希姆莱),但是自从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德国对苏联发起进攻,共产党人就同纳粹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对于社民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多数具有“大德意志”思想),纳粹政权在“合并”后,一方面通过极其有针对性的劳工政策阻碍他们发起抵抗,另一方面通过罗织叛国罪名与宣判死刑镇压他们。1938 年 10 月,希特勒青年团对大主教宫殿的冲击使得天主教会如梦初醒,许多牧师开始组建非法的青年团体,并因此遭到处决。然而主教团始终没有向信众发出反对纳粹统治的“牧函”。无论如何,以天主教为背景的保守抵抗组织(含君主主义者)培养出了对奥地利的强大认同感。正当纳粹政权忙于遣送并屠杀维也纳的犹太人之时,维也纳的捷克人虽然也是战战兢兢,却安静得出奇。他们无须服兵役,但是必须在维也纳和下奥地利的工厂服劳役。而布尔根兰的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独立国”与德意志帝国的关系十分友好)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较好地融入了当地,他们的命运与布尔根兰的德意志人相同,在战场上也有死伤。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亚人也必须参军(阵亡者数以千计),然而在 1942 年 4 月有超过 900 人被迫从克恩滕迁到“老帝国”,于是他们试图逃跑并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以躲避兵役。随着游击战在下克恩滕愈发激烈,数百人为之牺牲。以罗兰德·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为首的人民法庭在 1943 年 4 月判处 13 人死刑和 22 人徒刑,原因是这些人支持游击队,而游击队则针对下克恩滕的平民开展报复行动,限制了上述惩罚的有效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45 年 5 月之后。^②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没有希特勒,就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会发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合并”之夜,维也纳发生了由邻居、雇员和熟人主使的抢劫,因为那些胆战心惊的犹太人如今已经失去保护,无力反抗。1938 年 5 月 18 日,“奥地利”的经济与就业部设立财产流通处,征收犹太人的财产如下:价值 3.2 亿帝国马克的工业企业、价值 2.66 亿帝国马克的有价证券、超过 5 亿帝国马克的地产以及价值 9 亿帝国马克的其他资产(住房、汽车和珠宝)。大约 2/3 的奥地利犹太人在财产被剥夺并缴纳“逃离帝国税”后成功逃亡。到 1938 年夏天,多数奥地利城市的犹太人已经“消失”了。在大约 3.3 万家“犹太企业”中,有超过 80% 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被解散并清算。大约 5000

^① Karl Stadler, *Österreich 1938 – 1945 im Spiegel der NS-Akten*, Wien 1966, 352; Wolfgang Neugebauer, Der NS-Terrorapparat, in: Emmerich Tálos, Ernst Hanisch, Wolfgang Neugebauer (Hg.), *NS-Herrschaft in Österreich. Ein Handbuch*. Wien 2001, 721 – 743;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78f.; Ulrich Herbert,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14, 413 – 419; Josef Schöner, *Wiener Tagebuch 1944/45*, Hg. v. Eva-Marie Csáky, Franz Matscher, Gerald Stourzh, Wien/Köln/Weimar 1992, 79f.

^② Dokumentationsarchiv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derstandes (Hg.),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Wien 1934 – 1945*, 3 Bände, Wien 1975, 328 – 340; Dokumentationsarchiv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derstandes (Hg.),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m Burgenland 1934 – 1945*, Wien 1979, 346 – 352; Radomir Luza, *The Resistance in Austria, 1938 – 1945*, Minneapolis 1984;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 – 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92 – 394; Wolfgang Neugebauer, Widerstand und Opposition, in: Emmerich Tálos, Ernst Hanisch, Wolfgang Neugebauer (Hg.), *NS-Herrschaft in Österreich. Ein Handbuch*. Wien 2001, 187 – 212; Arnold Suppan, *Die Österreichischen Volksgruppen. Tendenzen ihr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83, 77, 115 – 122 u. 168 – 175; Michael Gehler, *Tirol im 20. Jahrhundert. Vom Kronland zur Europaregion*, 2. Auflage, Innsbruck/Wien 2009, 188 – 190; Josef Rausch, *Der Partisanenkampf in Kärnten im Zweiten Weltkrieg* (Militärhistorische Schriftenreihe, Heft 39/40), Wien 1979.

家公司被“强制雅利安化”。^① 不少纳粹的宠儿因此获利。特别是在维也纳,恐怖的“雅利安化”“替代了纳粹曾经承诺却没能兑现的中产阶级政策”。单单是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纳粹暴徒就在维也纳捣毁了40多座犹太教堂,杀害了27名犹太人,洗劫了超过4000家店铺。早在1938年初,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就带领手下在维也纳建立起一个“负责遣送犹太人的中心机构”。1939年秋天,首批奥地利犹太人被运往不久前刚刚设立的总督辖区。1941年秋以后,这一进程大大加快,犹太人不仅被运往泰雷津和奥斯维辛,还被送到东欧其他有集中营的地方。^② 希特勒政权在全欧洲范围对犹太人实施有计划的大屠杀,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早在1939年1月,希特勒就在帝国议会上威胁要消灭犹太人。1941年12月12日(对美国宣战第二天),他又在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面前重复了他的威胁。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上,领袖的态度很坚决——就是要彻底解决。他预言,如果犹太人再次引发世界大战(这是原话!),他们就会自取灭亡。这绝不是空话。世界大战已经到来,犹太人的灭亡将是必然的结果。”^③ 事实是有560万欧洲犹太人死于大屠杀,多数人是直接被杀害的。1938年奥地利有19万犹太人,其中有65459人沦为纳粹灭绝政策的牺牲品。尽管当时的保密措施极为严格,还是有数以千计的党卫军、盖世太保、保安处人员、警察、宪兵和集中营看守参与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并且涉及军人、帝国铁路职员和军工从业人员。^④

有7名奥地利的大区领导和帝国总督,还有227名出身奥地利的将军(147人出自陆军、27人出自空军、9人出自武装党卫军、20名出自警察、1人出自宪兵团、22人出自医疗和技术部门以及1名海军少将)不仅在对“奥地利人”的统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纳粹对各占领国的统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总督辖区、荷兰、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希腊、克罗地亚,1943年9月起在意大利北部)。奥地利人也在各集中营担任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Franz Stangl)在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齐格弗里德·赛德尔(Siegfried Seidel)、安东·伯格(Anton Burger)与卡尔·拉姆(Karl Rahm)在泰雷津,阿蒙·戈特(Amon Göth)在普拉佐集中营。因此人们丝毫不惊讶,德占荷兰总督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与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在纽伦堡作为主要战犯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对“奥地利的”纳粹骨干与将军的处决也发生在贝尔格莱德与卢布尔雅那。^⑤ 其他人则是在被捕后或是在盟军的监狱里自杀身亡。^⑥

^① 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银行、各大商场(维也纳的Herzmansky与Gerngross、格拉茨的Kastner & Öhler、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的Schwarz等等)、库夫纳啤酒厂、希滕贝格子弹与兵器制造厂、伦茨格勒造纸厂。

^② 尼斯科、奥波菜、凯尔采、罗兹、考纳斯、里加、明斯克、玛丽·特罗斯特内兹以及索比堡。

^③ 引自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Darmstadt 2000, 651; Ernst Hanisch,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1990,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Wien 1994, 381–383; Roman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Wien 1995, 420–422; Bruce F. Pauley, *From Prejudice to Persecution. A History of Austrian Anti-Semitism*, Chapel Hill 1992; Werner Welzig (Hg.) unter Mitarbeit von Hanno Biber und Claudia Resch, „Anschluss“ – März/April 1938 in Österreich, Wien 2010, 67–70; Götz Aly, *Hitlers Volksstaat. Raub, Rassenkrieg und nationaler 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2005, 54–58。

^④ Raul Hilberg, *Die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Band 3, Frankfurt am Main 1990, 1299f.; Erika Weinzierl, *Zu wenig Gerechte: Österreicher und Judenverfolgung 1938–1945*, Graz 1969; Adam Tooze, *Ökonomie der Zerstörung. Di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2008, 598–607; Roman Sandgrub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Wien 1995, 420–422;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1945*, Chapel Hill 2000, 131–152.

^⑤ 例如1941年4月空袭贝尔格莱德的指挥官亚历山大·勒尔(Alexander Löhr)大将,驻塞尔维亚的党卫军高官奥古斯特·梅斯内尔(August Meyszner)中将,克恩滕的帝国总督与大区领导弗里德里希·雷纳(Friedrich Rainer)。

^⑥ 例如总督辖区的党卫军和警察头目、“莱茵哈特计划”的执行者、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与山地部队的指挥官弗朗茨·波姆(Franz Böhme)将军。

纳粹在维也纳、布拉格与柏林的“犹太事务专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他虽然出生在德国,却是在林茨长大,他任用提拔了许多奥地利人(人称“艾希曼的人”),他们对犹太人的驱逐将半个欧洲笼罩在恐惧之下。负责审判艾希曼的副检察官加布里尔·巴赫(Gabriel Bach)假定艾希曼有着杀人犯的动机:他视自己为“犹太事务专家”,认为自己在帝国保安总局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狂热地投身到灭绝犹太人的使命中去了。^①

七、战争的残酷结束

希特勒的士兵(包括出身奥地利的那些)既体验了对各国^②的占领统治,也领教了其反面——来自被压迫被剥削一方的报复。1944年9月中旬,E集团军群总司令勒尔大将接到了从希腊撤退的命令。由于红军已经开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且正向塞尔维亚推进,E集团军群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陆上联系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德军士兵(其中有很多来自奥地利)从比雷埃夫斯港口撤退时,已经能够感受到希腊游击队的彻骨仇恨;在塞萨洛尼基港口,他们遇到了英国对储油罐和炼油厂的轰炸;在马其顿,他们运输列车的锅炉机遭到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在普里莱普一带,他们遭到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袭击。已经投奔红军的保加利亚军队使用德国俯冲轰炸机和意大利轻型装甲车向他们发起进攻。勒尔大将不得不改变撤军路线,借助一系列防御战和侧翼掩护(类似国际象棋中的“王车易位”),辗转科索沃、塞尔维亚西部、波斯尼亚东部和斯拉沃尼亚。勒尔直到1945年5月10日才在下施泰尔马克缴械投降,15万人跟着他进了南斯拉夫战俘营,但最后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得以幸存。^③

随着红军从匈牙利西部向奥地利东部节节推进,1945年3月底以后,纳粹政权的暴力恐怖统治再度升级。为了组建“人民冲锋队”,老年与少年男子都被征召入伍。纳粹试图通过散布恐惧逼迫人们献出最后的忠诚。在“东南墙”修筑防御工事的匈牙利犹太劳工被迫开始了前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死亡行军。集中营的犯人、政治犯与战俘被有组织地杀害。纳粹的爪牙忙于搜捕隐匿的犹太人与政治反对派。大区领导席拉赫在维也纳实行了军事管制。流动的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数百名逃兵死刑。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与破坏,军队内部的抵抗者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将维也纳和平移交给苏联,他们的努力宣告失败。在“第三帝国”崩溃之际,1915—1924年间出生的奥地利青壮年男子中,已有约1/3死亡或失踪。数十万苏台德德意志人、匈牙利德意志人、多瑙德意志人与下施泰尔马克人,或是被驱赶,或是为了躲避红军,正在逃往奥地利的途中。“奥地利人”感受到了前线的逐步退缩,开始同纳粹政权拉开距离,并且认为那些纳粹党魁是战争和崩溃的罪魁祸首。盟军的

^① Arnold Suppan, *Hitler-Beneš-Tito. Konflikt, Krieg und Völkermord in Ostmittel- und Südosteuropa*, 3 Bände, 2. Auflage, Wien 2014, Band 2, 1267 – 1273 u. 1355 – 1361;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 – 1945*, Chapel Hill 2000, 213; 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Biographie*, 3. Auflage, München 2008, 361 – 364; 参考 Hans Safran, *Die Eichmann-Männer*, Wien 1993; Alfred Elste, Michael Koschat, Hanzi Filipič, *NS-Österreich auf der Anklagebank. Anatomie eines politischen Schauprozesses im kommunistischen Slowenien*. Klagenfurt-Ljubljana-Wien 2000; Dokumentationsarchiv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derstandes (Hg.), Täter. Österreichische Akteur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Jahrbuch), Wien 2014; Gabriel Bach, Wenn jemals einer die Todesstrafe verdient hat, dann Adolf Eichmann, in: *Die Presse*, 27. 11. 2011, Wien 2011, 38f.

^②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与苏联。

^③ Arnold Suppan, *Hitler-Beneš-Tito. Konflikt, Krieg und Völkermord in Ostmittel- und Südosteuropa*, 3 Bände, 2. Auflage, Wien 2014, Band 2, 1287 – 1290; Leopold Rosenmayr, *Im Krieg auf dem Balkan. 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 an den Zweiten Weltkrieg*, Wien/ Köln/Weimar 2012, 113 – 218; Manfried Rauchensteiner, *Krieg in Österreich 1945*, Wien 1970, 323 – 325. 尽管德国已经投降,还是有几支部队继续行军至克恩滕东南部与施泰尔马克西部,例如第一一八猎兵师直到1945年5月15日才在霍赫奥斯特维茨城堡脚下被解除武装。

宣传也促使各群体(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天主教徒和君主主义者)与纳粹政权拉开了距离。红军的胜利进军鼓舞了奥地利的亲共产党力量,两个奥地利营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框架下得以建立。奥地利各地的逃兵数量都在增加,全无构筑“阿尔卑斯山堡垒”的样子。很多受害者都期盼着跟恐怖政权的执掌者与同流合污者秋后算账的一天早日到来,但后者中选择自杀的不在少数。最终是盟军迫使纳粹当权者缴械投降并踏上逃亡之路,将奥地利从纳粹统治下解放了出来。^①

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的极权统治体现了极权主义的领袖原则与领袖崇拜。它是一个军事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人民共同体”,导致了本国人民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持续堕落。它采用了史无前例的媒体操控手段以控制、动员群众,代表着不断升级的暴力运用与国家镇压。它对敌人(假想的或真实的)的排斥、告发与迫害有目共睹。它所推崇的“种族优越论”这一生物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它本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犬儒主义充分利用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它无视国际法,发动了残酷的战争。它对各民族肆意地进行了整体奴役与灭绝。德国人、奥地利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源自奥匈帝国、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的过去),然而只有希特勒与他的随从做到了把各种不同的矛盾冲突捆在一起并将其激化为各民族或各族群整体之间的仇杀。^②

我们不应被持续发展的“现代性”(诸如汽车、装甲车、飞机与火箭等科技发明以及高速公路与发电厂的建设)所蒙蔽,如果没有纳粹政权,德国与奥地利的工程师一样会创造出这些科技成果。纳粹主义试图推行另一种激进的现代性。纳粹政权夺走了至少37.1万奥地利男女的生命。他们来自不同的受害群体:其中有24.7万名阵亡或失踪的士兵,65500名犹太人(多数在灭绝营被杀害),32000人死在集中营、监狱或者盖世太保羁押中(其中有大约7000名罗姆人),24300人死于轰炸,2700名抵抗运动战士被处决。这就意味着,从1938年3月13日到1945年5月8日,奥地利总人口的大约5.6%残酷丧生。希特勒最后留下的遗产只有毁灭:“没有任何建筑、任何艺术、任何政治结构或者经济模式,在道德准则方面最为稀少——简而言之,他没有为后世留下任何东西。”^③我们可以再补充一句:在人文、社会与文化科学领域也没有新的进展。生于1923年的社会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是“战争世代”的一员,他在2005年5月提出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在欧洲拥有一段共同的历史,却没有共同的记忆,这一事实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对于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④

[作者阿诺德·苏潘,奥地利科学院院士,原奥地利科学院副院长,原维也纳大学东欧历史研究所教授;译者陈琛,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Foreign Office/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Hg.), *Austria Basic Handbook*, London 1944/4, Kap. VI: Austria at War; Josef Schöner, *Wiener Tagebuch 1944/45*, Hg. v. Eva-Marie Csáky, Franz Matscher, Gerald Stourzh, Wien/Köln/Weimar 1992, 112–168; 41 Tage. Kriegsende1945. Verdichtung der Gewalt, Ausstellung am Heldenplatz und im Äußeren Burgtor, Wien, 16. April – 3. Juli 2015; Andreas Wang, Ein manisch-depressives Vol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4. März 2015, 6.

② Ian Kershaw, *Hitler 1936 – 1945*, Darmstadt 2000, 7 – 11 u. 1078 – 1082; Hans-Ulrich Thamer, *Verführung und Gewalt. Deutschland 1933 – 1945*, Berlin 1986, 339;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 – 1949*, 3. Auflage, München 2008, XVIII – XIX.

③ Ian Kershaw, *Hitler 1936 – 1945*, Darmstadt 2000.

④ Norbert Frei, Führerbilderwechsel. Hitler und die Deutschen nach 1945, in: Hans-Ulrich Thamer, Simone Erpel (Hg.): *Hitler und die Deutschen. Volksgemeinschaft und Verbrechen*, Dresden 2010, 142 – 147; Reinhart Koselleck, Der 8. Mai zwischen Erinnerung und Geschichte, in: Ders.: *Vom Sinn und Unsinn der Geschichte.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aus vier Jahrzehnten*, Hg. v. Carsten Dutt. Berlin 2010, 254 – 265;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 – 1945*, Chapel Hill 2000, 227.